

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逻辑、要素与路径

闫 静¹, 徐诗视², 温雨竹³(1. 云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2.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云南 昆明 650500; 3. 吉林体育学院
研究生处, 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精准化和科学化是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厘清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影响要素并探索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提升赋权增能。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我国31个省域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影响要素与策略选择进行分析,首先确定健身参与服务、健身设施服务、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公共预算、生产条件、收入条件、投资条件等7个影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前因条件,然后通过组合各条件变量形成多样化组态,最后确定核心组合样态并根据样态模型提出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提升策略。

【关键词】: 健康中国; 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 体育治理; 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 G8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6-0011-13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1207.00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是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为践行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和满足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及健康需求,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方式亟需从传统低效粗放向统筹整合、共享协同、高效精准转变^[2]。目前,学界针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分析^[3]、战略价值^[4]、绩效评估^[5]及发展路径^[6]等方面,既有研究多以事实陈述和思辨方式开展,关于绩效评估的研究虽然可以衡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效果,但主要用来衡量治理能力的好坏,不能充分反映和揭示哪些或哪个方面的治理能力的强与弱。事实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是由多重要素交叉组合、复合作用的结果,需要从整体的角度识别影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并通过不同关键要素的组合来确定其影响程度,从而探寻有效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路径措施。

因此,研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分析影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并尝试抽取不同要素组合探讨其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影响,以期深化对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规律认识并为提升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1 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三重逻辑

1.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历史逻辑

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虽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产物,但自“全民健身计划”提出以来,历经数十年的奋斗历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从未缺席,并呈现为一个不断发展、演进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从历史逻辑层面分析,依据全民健身重要政策节点及治理成效,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可以细分为社会化管理(1995—2011年)^[7]、服务型治理(2012—2020年)^[8]及数智化治理(2021至今)^[9]三

收稿日期: 2023-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 & ZD343)。

第一作者: 闫 静(1979—),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体育管理、体育健康促进。

个渐进发展阶段。系统梳理历史逻辑,把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从管制型治理、管理型治理到服务型治理再到数智型治理的演进逻辑,可以为推进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以及今后中国式群众体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重要的研判依据。

第一历史时段,从社会管制型治理到社会管理型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群众体育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状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加入WTO等重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从“无”到“有”,并渐进适应国家转型、企业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的需要。1995年,国务院发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概念及其内涵被不断丰富,相关治理话题在体育治理过程中不断渗透和传播。正是这一阶段,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由“司局管制”向“部委管理”战略性转向,被纳入国家体育总局层面统筹协调。2009年,《全民健身条例》正式施行,同时确立了“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关注。2011年,国务院下发《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进一步增强了全民健身意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内容也被不断细化。在社会管理阶段,全民健身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打破了“上下分离”的体育治理格局,制度化、规范化及法治化是该时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典型特征。但该阶段的治理仍较为碎片化、难以形成整体性和系统化,在大群体格局中还需要多部门深度合作、携手共治、渐次推进,治理效能亟需从低水平走向高效率。

第二历史时段,从社会管理型治理到社会服务型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及新战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新时代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也迎来了全新机遇。2014年,全民健身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成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领导主体,相关部委成为责任主体;2015年,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并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中健康维护价值得以升级;2016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颁布,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现代化治理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提出更高要求;2019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出台,明确了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以及发展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的全民健身的任务书和路线图。在现代化治理阶段,注重强调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时代性、特殊性和责任性,呼唤从单一、局部、碎片化和盲目性的治理走向系统全面、整体协调且良性有序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在此过程中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也正式进入“国家战略”阶段,必然要求参与治理的主体、客体及介体保持高度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体系自觉,彰显国家意志、国家能力和国家实力。但全民健身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等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在服务体育治理现代化中应有可为且大有可为。

第三历史时段,从社会服务型治理到数字智能型治理。立足新发展阶段,2021年以来国家层面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关于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新一轮政策文本,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提供了更多制度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并对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深入阐释,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指明了道路方向。同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于202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做好了法治保障。这一阶段,数智化发展体现社会和经济向新范式的根本转变,带来现代基础设施体系与社会发展治理模式等的革新与重构,其中数据和信息既是公共治理的基础,也已成为公共治理本身,引致社会治理向度的变化。在群众体育领域,数智赋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变革,对以人为本提出新的要求,推动社会服务向网络化和体系化转向,促进政府服务向智能化和精准化转型。在数智化治理阶段,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性、突出的高阶性和显著的系统性等全新特征。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一是,需要立足人民、多方参与且面向社会,致力于服务全民、全民共建且全民共享;二是,要高点定位、高质量建设,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三是,既要着眼全局、整体推进,又要抓住关键、重点突破。将治理全要素融入更高质量、更高

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全过程,势必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客体立体化、治理目标人本化、治理方式规范化以及治理手段文明化。

纵观数十年来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第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社会化管理到服务型治理再到数智化治理,每个阶段的治理走向都为后续治理奠定坚实基础,也为治理改革指明前进方向;第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始终坚持把服务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建设作为根本使命,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是一个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过程,基于三个不同时段体育治理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形成了各具时代性的治理思想认识与创新理念,并出台了不同制度、法律与政策加以推进治理实践,同时,以总结历史的治理经验与教训反哺调整指导思想及政策;第四,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呈现出渐进的、系统的发展趋势,既是“量的增长”过程也是“质的提升”过程,更是不断学习探索、持续改革创新的历史进程,它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频共振,中国式的治理方式不断规范,现代性的时代内涵不断增强。

1.2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反映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内在要素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定性,决定治理要素的性质与方向。通过反映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内在特征和本质属性,能够精辟应答“是何治理”“为何治理”“如何治理”等关键问题,是新时代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重要理论遵循。

从“是何治理”来看,系统性阐释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概念、内涵及具体内容,作为了解治理学理逻辑的认知基石。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运用治理思维方法及手段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改革、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制度、强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以有效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引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目标实现的一种行为方式与调节机制。中国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命题和构成内容,其本质含义是统治者治理国家和处理政务之意,新时代的治理注重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涵盖“体

系一能力”关系、“党政引领”理念以及“治理文明”建设等三大范式。具体内容主要涉及治理结构、运行机制、绩效评价和实现路径等。从治理结构上看,区分了治理的主客体,政府^[10]及相关社会组织^[11-12]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治理过程中发挥主导与规划的作用^[13];而公众作为服务的接受者,在治理环节起到反馈和监督作用^[14]。关于运行机制主要涉及治理方式的选择,如政府主导型^[15-16]、市场化治理模式^[17-18]以及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混合式治理模式^[19]。而绩效评价注重探索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效果评估以改进并提升综合治理能力,通常从供给侧或需求端构建治理评价指标体系^[20],以服务质量^[21]、服务成效^[22]、政府行为^[23]、社会需求^[24]、健康促进^[25]及公众满意度^[26]等维度展开。实践路径多以新发展阶段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现状及对策建议等研究为主,旨在探求未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变化趋势与方向^[27-28]。

从“为何治理”来看,形塑中国特色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体系,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时代使命。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上创新开展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工作,不同历史时段赋予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不同的历史使命。2012年以前是“治理萌芽”时期,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该阶段研究以全民健身的政策解读^[29-30]、概念特征^[31]、理论内涵^[32]和发展现状^[33-34]居多,有关治理主题研究仅涉及大众体育公共治理的治理途径^[35]、发展模式^[36]以及全民健身市场网络运行机制引入^[37],虽有部分代表性成果但整体研究较为零散且尚未形成理论体系。2012年至2020年,进入“治理探索”时期,新时代以来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推动管理服务下移、权限下放、资源下沉,不断探索机制创新和体制变革,变“治理末梢”为“治理靶心”,最终目的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阶段多元主体治理和精细化治理出现,但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领域为出发点探讨治理的成果较少,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现代化日渐成为焦点^[38-42]。2021年以来,进入“治理文明”时期,“十四五”时期对新发展阶段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演化,最终目的

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该阶段治理趋于多元化,数字技术创新渗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领域^[43-44],并衍生了“互联网+治理”“数字治理”“智慧治理”“智能治理”等新热点^[45-48]。

从“如何治理”来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中国之治”经验,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成效的创新成果。一是,强调多中心治理,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探讨各主体共同参与全民健身多边治理活动^[49],包括公共服务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范围、治理机制和治理评价等5大要素;二是,开展整体治理,整体性治理思维可以有效应对公共体育服务治理的碎片化问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隶属于公共体育服务范畴,结合系统方法论能优化全民健身资源供给从而提升公共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50-51];三是,透析网络治理,创新社区全民健身的发展模式^[52],全民健身网络治理需要民众参与^[53]、社会团体组织^[54]、经济支持^[55]与健身场景^[56]等条件共同营造治理环境;四是,倡导协同治理,对传统行政治理模式的创新,可有效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府主导,其他主体多元并存的模式^[57-59];五是,尝试复杂系统治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系统具有层次性,基于该理论建立的治理体系更加精准、全面、高效^[60-61]。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是结合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转化而形成的时代工具,多维视阈的治理理论是理论基石,当代全民健身思潮是理论宝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全民健身的重要论述是理论来源,三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并相互融合,也构成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原创性理论范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演进脉络呈现本土性、复杂性和渐进性特征,新时代治理路向涌现出的新问题、新特点和新形势,要从纵向时序线路辩证看待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学理嬗变。

1.3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表明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当下的实践、发展了的实践,是政府与公众健身行为客观关系的系统,同时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制度的产物。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实践

中运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发展。当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面临政府治理与地方治理分离、场地设施服务布局不优、健身载体不新、服务总量不足、服务质量不高以及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等现实问题。实践逻辑反映新时代治理“如何做”的方式问题,通过对具体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以治理理论联系实际,探索影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要素,并以实施元治理行动为方向。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问题从实践中来,通过梳理具体问题能够“找准症结”并“对症下药”。从具体问题上,我国全民健身运作程序的规范性不够^[8],在传统组织管理体制的影响下,横向网络化协调机制运行不够通畅^[62]。在开展治理实践工作中,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碎片化现象严重^[32],主体间互动协调不足,民众需求与现有体育资源不匹配,一些体育资源(如高校的体育场馆)较为封闭,大众利用率较低^[63]。目前,由于我国城乡体育资金投入不均衡和乡村大部分居民体育锻炼意识缺乏,参与积极性较低,均影响到治理效率^[64-66]。在推进治理实践工作中,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仍存在政府管理碎片化、财政投入不均等、资源配置不平衡、过度监管与监管不足并存、职能交叉、机构间协调不足等问题。在落实治理实践工作中,具体治理效能问题还涉及民众健身需求与政府服务供给失衡,现有健身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政策制定中民众参与感较弱,城乡不同区域大众对全民健身服务资源的获取能力和获得渠道不平等,以及在治理实践过程中仍以政府主管为主要形式,未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体育组织等多元协同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路向到实践中去,通过厘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来抓住重点,解决关键问题。从关联要素上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被视为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提升与深化群众体育治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复杂性视角下公共服务治理的影响要素及行动路径认知尚不全面,围绕哪些要素影响及如何影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识别或验证碎片化治理要素,而极少有对组合模式的整体性探索^[67-68]。碎片割据化传统治理方式亟须向现代精细化治理方式转变,突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难题要求社会多元主体统筹协作并联

动应对。影响治理组织结构之外的关联要素涉及如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出发关联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发展^[69],从技术上寻求突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智慧化升级^[70],从体制模式上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与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等其他领域协同发展^[71],从功能性角度分析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如何兼顾健身与健康等^[72]。

综上所述,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具体实践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实现全民健身战略目标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管理改革,政府协同多元化利益主体和公民个体,共同参与管理全民健身公共事务和推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持续过程。实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依循,它以体育现代化为核心、以民生需求为导向、以供求关系为主线,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领域进行多角度、立体式、全方位及深层次治理。要让更多质量、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为新时代我国群众体育发展服务,切实解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较为紧迫硬核的问题,新发展阶段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需要把握体育现代化内在规律,塑炼治理现代化实践形态。

2 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影响要素

2.1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引介

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可根据集合形态区分为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多值定性比较分析(mvQCA)三种类型^[73-75]。基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成效是由多层次多维度相关要素彼此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研究通过fsQCA法探索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

起正向推动作用的要素及组合方式^[76-77]。具体依据是定性比较分析法可根据不同案例的实际情况,一是,将fsQCA赋值到不同的层次进行取值^[78];二是,fsQCA根据影响要素对所有可能的逻辑路径进行组合,便于最终结果的选择^[79-80];三是,fsQCA本身特有的研究复杂因果问题的特质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效果的复杂属性相匹配;四是,fsQCA契合于多案例的比较研究,各省域影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效果变量庞大的操作难题迎刃而解。据此(图1),由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内部子系统及外部介体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全民健身设施服务、经济支持、社会环境等条件同时具有差异性,fsQCA的组态视角对研究具有关键性价值,解决了常规定量研究无法获得多要素组合的困境,因此本研究采用fsQCA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要素及其组态模式进行分析。

运用fsQCA方法的思路如下:①从全民健身报告等资料中收集、整理并汇总数据,选择所需的案例样本,确保案例能覆盖不同的条件分布与公共服务水平等要素;②基于影响要素模型考量不同层次的要素,合理设置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并进行赋值;③对案例进行深度分析,对应变量设置构建真值表,通过运行fsQCA3.0软件得出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④结合布尔运算法则将结果进行最简化处理,得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组态模式以给出最优化路径。

2.2 案例选择

遵照系统性与目的性、全面性与精炼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和可获得性原则,从实证角度出发,收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体育局或政府官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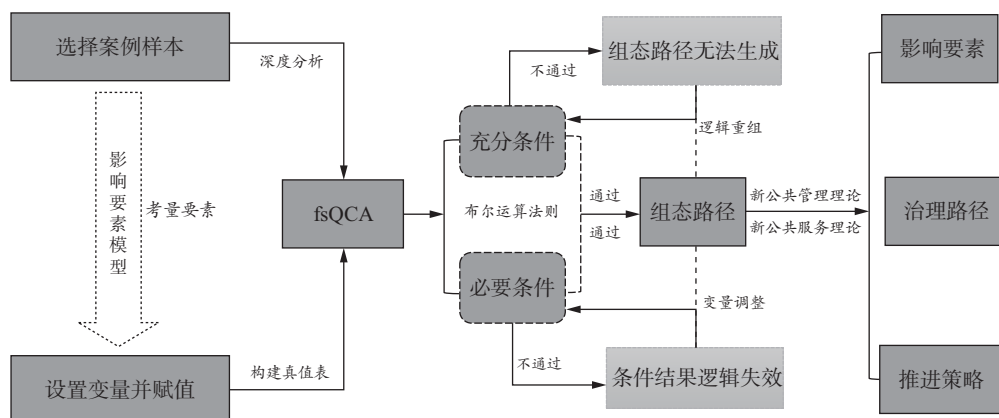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QCA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for national fitness based on QCA

《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各省域经济指标以及“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实施效果评估报告的相关数据,组成31个综合案例样本。

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案例样本中,原始案例条件选择确定了30个指标,参照影响全民健身的内源性与外源性要素,经济水平制约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属于外部性驱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对社会经济的反哺属于内在动力,鉴于此,主要考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外部性经济性水平和内在性服务水平。其中,衡量内部性水平指标21个,分别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D1)、《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总体合格达标率(不含学生)(D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m²)(D3)、每万人体育社会组织数(个)(D4)、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数(人)(D5)、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优秀达标率(D6)、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率(D7)、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D8)、15 min健身圈在城市社区的覆盖率(D9)、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率(D10)、《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覆盖率(D11)、《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测试人次(D12)、每年举办县级及以上全民健身赛事和活动次数(D13)、以提供健身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互联网平台(D14)、出台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实施的相关政策(D15)、彩票公益金投入全民健身经费的比例(D16)、财政资金(包括彩票公益金)人均全民健身经费投入(D17);衡量外部性水平指标9个,包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D1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D19)、地区生产总值(D20)、人均GDP(D21)、人均可支配收入(D2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D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D24)、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情况(D25)、实际到位资金比上年增长情况(D26)。

2.3 条件选择与模型分析

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条件要素进行甄选,以内源性的服务驱动和外源性的经济驱动为主要研判依据,确定内部性服务水平(B1)和外部性经济水平(B2)两大要素作为前因条件广义维度。初步探索的内部性服务水平要素细分为9个维度,包含体育锻炼参与(C1)、体质健康水平(C2)、体育健身设施(C3)、体育健身组织(C4)、体育健身指导(C5)、体育健身活动(C6)、体育信息化(C7)、政策保障(C8)

和经费保障(C9);而外部性经济水平要素细分为4个维度,即公共预算类(C10)、生产类(C11)、收入类(C12)和投资类(C13)。最终条件选择将目标层定义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影响要素模型(A),遴选出7个前因条件分别是:健身参与服务(A1,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健身设施服务(A2,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A3,每万人体育社会组织数与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数加权)、公共预算(A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权)、生产条件(A5,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GDP加权)、收入条件(A6,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者加权)、投资条件(A7,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情况与实际到位资金比上年增长情况加权)。

本文通过加权算术平均法和极值处理法将26个指标消除量纲并标准化,所以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X_{ij} 表示第*i*个地区的第*j*个指标实际值, X'_{ij} 表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消除量纲后的虚拟值($X'_{ij} \in [0,1]$), $\text{Max}_i(X_{ij})$ 表示第*i*个地区中 X_{ij} 的最大值, $\text{Min}_i(X_{ij})$ 表示第*i*个地区中 X_{ij} 的最小值,结合实际需要构建各类指标标准化模型(公式1.1)如下:

$$X'_{ij} = \frac{X_{ij} - \text{Min}(X_{ij})}{\text{Max}(X_{ij}) - \text{Min}(X_{ij})} \quad (\text{公式1.1})$$

汇总遴选后得到13个有效指标,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后最终得到7个前因条件。通过测算各变量条件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表1),影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要素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如健身参与服务、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二者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生产条件与健身参与服务、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公共预算相关性较强,收入条件与健身参与服务、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公共预算、生产条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投资条件中出现负相关系数,同时与健身设施服务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结果也证明了7个前因条件的存在性及关系的复杂性。

2.4 数据校准

数据校准是案例的前因条件集合隶属度特殊赋值,转换隶属分数以更好生成组态,隶属分数介于0和1之间^[81],三个定性锚点分别为完全隶属、完全不隶属和交叉点,通过运行布尔算法进行校准^[82]。在实施fsQCA前,综合考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条件变

表1 相关系数表(N=31)
Tab.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able (N=31)

	健身参与服务	健身设施服务	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	公共预算	生产条件	收入条件	投资条件
健身参与服务	1						
健身设施服务	0.184	1					
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	0.407*	0.283	1				
公共预算	0.201	0.075	0.212	1			
生产条件	0.506**	0.305	0.429*	0.807**	1		
收入条件	0.665**	0.342	0.429*	0.472**	0.830**	1	
投资条件	-0.110	0.370*	0.068	0.185	0.068	0.069	1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

量与结果变量的隶属度,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适用于模型构建^[83]。结合已有研究,参照合理性与便利性原则,基于样本数据的频率分布选择锚点,三个锚点的设置分别为完全隶属、交叉隶属和完全不隶属,分为95%、50%和5%分位数^[84]。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影响要素的数据校准思路:首先,对30个指标变量进行数据校准,结合熵值法将30个指标变量转换为7大前因条件;其次,对7大前因条件的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锚定不同分位数测算出完全隶属点、交叉隶属点和完全不隶属点。最终得到数据校准结果汇总成表(表2)。

表2 数据校准结果
Tab.2 Data calibration results

前因条件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健身参与服务	0.471	0.369	0.305
健身设施服务	2.845	2.01	1.34
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	8.89	3.02	1.925
公共预算	20 266.994	8 295.135	2 331.366
生产条件	199 981.5	89 422.17	54 036.12
收入条件	161 093.929	80 892.248	7 0709.781
投资条件	32.45	9.4	-16.3

2.5 必要性分析

必要性分析有助于对数据结果的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作出判断和选择,通常该值最好高于0.9^[85]。同时,对模糊集逻辑余项进行“非”(∼)运算(公式1.2),对于任意模糊集A来说,逻辑上“非”模糊集A的隶属分数计算公

式为:

$$\sim A = [1] - A \quad (\text{公式1.2})$$

研究中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结果变量为Y1,min表示“条件组合与结果变量相比较中隶属分数较小的单个变量”。 YA_i 表示“条件组合中的隶属分数”, Y_i 表示“结果的隶属分数”。当所有 YA_i 均小于或等于相对应的 Y_i 值时,变量标准化的隶属分数为1.00,反之,则一致性下降到低于0.5;当少数 YA_i 略微超过相对应的 Y_i 值时,变量标准化的隶属分数则接近1.00。上述中A1至A7分别代表健身参与等7大前因条件初变量,经标准化后得到对应的 YA_1 至 YA_7 等7个条件变量($i=1,2,3,4,5,6,7$),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中一致性(公式1.3)和覆盖性(公式1.4)检验计算公式如下:

$$\text{Consistency}(YA_i \leq Y_i) = \sum_{i=1}^7 [\min(YA_i, Y_i)] / \sum_{i=1}^7 YA_i \quad (\text{公式1.3})$$

$$\text{Coverage}(YA_i \leq Y_i) = \sum_{i=1}^7 [\min(YA_i, Y_i)] / \sum_{i=1}^7 Y_i \quad (\text{公式1.4})$$

由于必要的条件变量会在后续的fsQCA步骤中消除,因此,为了避免对结果产生影响需要对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当一致性大于0.9时,表明该条件变量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必要要素。由表3可知,结果变量影响要素与非结果变量影响要素的一致性与覆盖性均小于0.9,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条件变量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必要条件,即单个变量无法促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要素发生改变。因此,要对影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

表3 条件变量必要性检验结果
Tab.3 Necessity test results of conditional variables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影响要素		~结果变量影响要素	
	一致性	覆盖性	一致性	覆盖性
健身参与服务	0.633 140	0.773 437	0.597 101	0.585 227
~健身参与服务	0.660 465	0.671 395	0.768 841	0.627 069
健身设施服务	0.733 140	0.771 679	0.677 609	0.572 242
~健身设施服务	0.593 605	0.696 500	0.729 638	0.686 882
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	0.647 733	0.774 218	0.633 986	0.607 992
~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	0.672 035	0.695 906	0.764 565	0.635 220
公共预算	0.661 628	0.721 578	0.678 333	0.593 558
~公共预算	0.627 326	0.708 517	0.681 812	0.617 834
生产条件	0.623 837	0.760 939	0.579 783	0.567 406
~生产条件	0.645 349	0.656 843	0.755 725	0.617 137
收入条件	0.640 640	0.810 877	0.555 797	0.564 427
~收入条件	0.655 872	0.647 924	0.813 768	0.644 995
投资条件	0.727 326	0.735 882	0.675 362	0.548 235
~投资条件	0.553 488	0.680 000	0.674 638	0.665 000

7个要素进行更深层次的组态分析,从而探究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影响要素和治理路径。

2.6 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包含充分性分析和标准分析两个步骤。首先,研究设定最小案例频数为1,阈值门槛设定为0.8,对PRI值小于0.7的标准行进行手动归零化处理^[86]。其次,进行标准分析,运用fsQCA 3.0软件运行各种路径后,会出现简单解、中间解、复杂解三种方案^[87]。由于简单解与复杂解的适应性较差,笔者以已有研究简单解为参照,把中间解作为最终的路径结果,并将PRI一致性的临界值设为0.7,在进行标准分析后选取中间解,得到7种影响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要素(表4)。

2.7 稳健性检验

检查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是QCA研究的关键步骤。调整一致性阈值为0.85,最终总体一致性值为0.847 352,总体覆盖度变为0.718 081;调整一致性阈值为0.9,最终总体一致性值为0.900 852,总体覆盖度变为0.571 57。表5揭示了单个组态中一致性阈值和PRI阈值调整后的结果,此外,对数据进行二分法重新整理,清晰集结果与模糊集结果基本吻合,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故认为上述以初始一致性临界

值设为0.8、PRI一致性的临界值设为0.7的分析结果是可靠的。

由组态分析结果可知(表4),组态1和组态2中,健身参与服务、公共预算、生产条件作为核心或边缘条件存在,此优化路径可以理解为“供给驱动型路径”,供给条件成为提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核心条件,同时不需要效果要素的辅助作用,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要素和投资要素可有可无。该组态单个解的一致性分别为0.922和0.907,原始覆盖度为0.24和0.245,唯一覆盖度为0.023和0.004。这说明充分发挥供给条件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中的“定位器”作用,牢固以“人民为中心”的优质供给理念,是优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路径的应有之义。

组态3、组态4和组态5中,收入条件作为全要素治理的共同核心要素,而公共预算要素可有可无,三组组态的一致性分别为0.94、0.931和0.894,原始覆盖度值为0.226、0.197和0.21,唯一覆盖度值分别为0.09、0.013和0.029。此路径可以理解为“需求导向型路径”,其应当作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以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双重驱动,通过提升收入水平、促进健身参与服务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渠道实现高水平治理,这也是未来地方

表4 组态分析结果
Tab.4 Configuration analysis results

前因条件	供给驱动型路径		需求导向型路径			多元共治型路径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组态 7
健身参与服务(YA1)	●	●	⊗	●	●	●	●
健身设施服务(YA2)	⊗	●	●	⊗	●	●	●
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YA3)	⊗	⊗	⊗	⊗	●	●	●
公共预算(YA4)	●	●	⊗	⊗	⊗	●	●
生产条件(YA5)	●	●	⊗	●	●	⊗	●
收入条件(YA6)	⊗	●	●	●	●	●	●
投资条件(YA7)	⊗	⊗	●	⊗	⊗	⊗	●
一致性	0.921 89	0.907 13	0.939 63	0.931 32	0.893 56	0.907 13	0.876 97
原始覆盖度	0.240 17	0.244 77	0.226 22	0.197 09	0.209 88	0.244 77	0.294 24
唯一覆盖度	0.023 31	0.004 65	0.090 17	0.012 79	0.029 07	0.004 65	0.092 50
总体一致性				0.902 57			
总体覆盖度				0.539 13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表示边缘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该条件即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政府可以考量的治理改革方向。

组态6和组态7中,健身参与服务、健身设施服务、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公共预算和收入条件作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核心条件,而生产与投资要素可以作为服务优化的辅助条件,可以不需要其辅助作用,二者组态的一致性分别为0.907、0.877,原始覆盖度值为0.245、0.294,唯一覆盖度值分别为0.005和0.093。此路径可以理解为“多元共治型路径”,这说明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加大经济供给推动服务升级,同时注重全要素多元治理,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各项成效上能做到提升,有助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5 Robustness test results

检验条件	供给驱动型路径		需求导向型路径			多元共治型路径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组态 7
Consistency 阈值>0.9	√	√	√	√	(√)	√	√
Consistency 阈值>0.85	(√)	(√)	√	(√)	√	√	√
Consistency 阈值>0.8	√	√	√	√	√	√	√
PRI 阈值>0.8			(√)			(√)	(√)
PRI 阈值>0.75	(√)	(√)	√	(√)	(√)	√	√
PRI 阈值>0.7	√	√	√	√	√	√	√
PRI 阈值>0.6	√	√	√	√	√	√	√
PRI 阈值>0.5	√	√	√	√	√	√	√
CRISP set	(√)	(√)	(√)	(√)	(√)	(√)	(√)
FUZZY set	√	√	√	√	√	√	√

注：√表示结果无实质性变化;(√)表示结果数值接近且变化小;“空白”表示结果有实质性变化

务体系。

3 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组态路径

3.1 供给驱动型路径:政府主导、部门联合、区域协同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动力

供给驱动型路径如组态1和组态2所示,健身参与服务、公共预算和生产条件是构成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要素,组态2中公共预算和生产条件可以成为推动与促进全民健身发展的核心条件。说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可作为未来全民健身治理的重要手段,改革趋向是注入生产要素、跟进生产技术、获得政府财政税收及购买公共服务的政策支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要求政府以民众为根本,以实践为工具手段,结合事物发展规律,持续优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结构与内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改进要通过资源合理配置来实现供需结构的双侧平衡。既要统建规划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场地、人力、财务、科技、信息等资源,又要在宏观层面给予政策支持。首先,持续提升预算透明度,推动打造阳光财政。各级政府应建立与其相匹配的财政预算准则,明确权力范围和管理界限,对各流程进行刚性约束管理,完善各单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长效评估机制,借助智慧化平台设立反馈系统,对财政预算、经费使用以及建设效果进行全面监管。其次,健全网格治理体系,变条块分治为网格集成。遵循布局均衡、整体协调、监管灵活的方针,成立相关“领导小组”,构建社区村落“一张网”格局,由小组成员领衔小范围管辖,实行科层制与赋权制治理并举,逐步形塑“以点及面”“由疏到密”“自上而下层层递进”“自下而上面面俱到”动态网谱。在县级及以下政府设置群众体育岗位专员,负责域内全民健身服务资源规划细分。最后,试行融合发展政策,消弭城乡服务鸿沟。城乡政府要合力夯实“体卫融合”,深化“体教融合”,促进“体旅融合”,可按照府际关系理论及“人口规模”标准进行等级分类,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按照不同等级给予相应数量分配。推动服务机构、服务项目、服务技术向基层覆盖延伸,打造“一乡多品”“一村一品”全民健身赛事服务,政府投资应倾向老少边岛地区,补齐农村现有缺口,以平衡城乡体育资源分配。

3.2 需求导向型路径:“以人民为中心”加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韧度

需求导向型路径整合组态3、组态4和组态5,收入条件是全民健身需求导向的核心条件。此外,组态3和组态5显示了健身设施服务也对目标结果产生一定影响,组态4和组态5关注到生产条件的重要性。客观上说明了需求导向应关注居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在健身需求上存在差异。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其不再将需求仅停留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而是追求更高质量和价值的外延社会属性。首先,从“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出发要以需求为基础,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需要遵循民众健康新需求,更加关注新市民、儿童友好和适老化的运动需求,增加便民化、个性化服务项目,如升级“5 min健身圈”“社区健身房”“健身综合体”以及夜间“点亮工程”。其次,挖掘人的主观能动性潜力,强化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业技能,广泛吸纳优秀教师、健身达人、运动网红、退役运动员及教练员,优化社会体育指导员年龄、等级结构,组织开展健身指导志愿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景区以及进晨晚练站点,并建立志愿者保险制度。全力支持社会体育组织、体育单项协会实体化,激励学校、企业、协会组织开展各类全员运动会,并逐渐形成系列赛事品牌,健全赛事监管机制并完善安全报备制度。最后,针对需求差异创新治理方式,尝试引入滚动治理、循数治理以及敏捷治理等模式,加大多元协同治理力度,政府可“两手抓”市场配置和宏观调控,达成社会多元力量合作理念,创新构建“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的治理模式,优化“党政统一领导、市域前线指挥、基层桥头堡”的社会服务治理层级功能,切实激发全民健身参与者的活力。

3.3 多元共治型路径:“数智”驱动加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科学性与均等化进程

多元共治型路径中相关变量条件数量更多,组态6显示健身参与服务、健身设施服务、健身组织与保障服务、公共预算和收入条件等都是全民健身治理的核心条件,而组态7涵盖了生产和投资条件等全部7类条件。说明全民健身治理过程中影响要素复杂多样,单一要素无法引致治理能力质变提升,诸多要素聚变综合符合系统论中整体思想。参照整体

性治理经验,在数字重塑社会的时代要以技术为保障、以协调整合与信任机制为关键,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应充分借助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发展多层次精准服务要素的集聚效应和多种服务模式的个性化效应,为全民健身参与者提供卓效、均等、优越、精准的“新服务”。首先,破除关键技术壁垒,通过数字设施、运行程序和操作系统,统筹推进智慧社区健身中心建设,开展智慧健身路径、智慧健身步道和智慧体育空间服务提升行动,创新探索运动医院、运动银行、运动农场和运动公园,也可以通过智能运动穿戴装备、智能运动器材、VR跑道、AR教练等形式布设智慧设施和数字系统。其次,完善信息协调机制与整合机制,构建精确全面的城乡区域开放共享平台,搭建集场馆预订、信息发布、流量监测、影像共享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运动平台,汇集区域内运动数据、运动计划、健身需求、期望服务、健身常识等信息,实现数据聚合管理、信息互联和服务开放化、集成化、智能化及协同化发展。利用智能技术治理,提供不受时空限制的智能服务,打造24 h全天候智能健身服务场景,改进和提升智能自助服务,打通线上线下、虚拟现实联合服务通道,利用智慧健身平台以及其他线上直播、社交平台实现多渠道协同服务,充分激活创新健身公共服务中的“用户智慧”。最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在做好数字化与智能化治理的同时,尝试构建“一体化”信任机制,由政府联动民众共同构建一个周密、系统的服务治理体系,还需要激发服务群体的积极性、拓宽服务领域,提供智慧健身增值服务,进一步引导“具身认知”“终身运动”“主动健康”观念的普及。此外,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管理方面,通过智慧管理系统构建存储和管理的数据中心,实现周密、安全、精准的海量健身参与者数据储存。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研究基于fsQCA方法对推进更高水平、高质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所涉及的要素进行改良设计与优化组合,从实证结果角度提给出了供给侧、需求端和“供需”综合层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三大路径。

第一,就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内部性而言。

一则,健身参与服务是全民公共服务治理的重要前提,健身参与率等基本情况作为衡量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社会力量应更关注如何提升全民健身参与,如何扩大全民健身人群范围,真正实现“全民”参与;二则,健身设施服务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重要一环,现代化治理中已不能满足于硬件健身设备的配齐,健身设施服务的智慧化推进及设备的现代更新需要在推进全民健身活动中重点考量和布局;三则,健身活动组织及其保障机制在运行中由于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导致部分团体组织和业务人员在治理过程中作用甚微,“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民健身发展更能契合群众参与健身的自发性和自组织性。

第二,就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外部性而言。一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预算要向以供给为导向转型,多元治理中强调了公共预算的重要性,政府的财政专项拨款和全民健身政策倾斜对现代化治理产生直接影响;二是,生产条件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的重要条件要素之一,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到生产技术的转型升级都会促成全民健身加速发展;三是,收入条件在全民健身治理不同路径中均能视为核心要素,收入差距是全民健身服务目前很难克服的困境,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全民健身的个体化及个性化差异;四是,现有全民健身发展较少关注到投资条件,但未来全民健身多元治理过程可充分考虑此影响要素,从而进一步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质量及水平。

4.2 研究建议

研究过程中,还有以下几方面需要改进:①数据方面,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据较为零散且没有固定统一的研判标准,该研究遵照数据的可获得性,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数据整理过程中不够完全客观。②方法方面,fsQCA方法作为一个类型学构建工具的模糊集在技术层面对数据处理有限,其他实证数据在另一框架下或许具有相关性而在QCA范式下无关联。③结果方面,QCA的生成组态在整合过程中的路径是从微观要素入手,对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宏观治理是否能有效对应有待商榷,实际应用及策略的可操作性上还需要持续关注该领域发展趋势。

对应未来的研究,拟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①数

据选取上,使用纵向追踪数据及社会群样本量等对全民健身治理开展更深层次分析,指标选取可以考量更多交叉学科文献资料;②方法应用上,后续研究注意案例的敏感度,重点解决黑匣子问题,QCA程序本身不包含时间和过程,要综合其他定性技术和定量技术的联系,如R语言、MAXQDA、Python等工具的尝试及COMPASS资源库的深度挖掘;③策略推行上,数字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存在诸多可能性挑战和机遇,未来需要更注重智慧化和数字化在解决全民健身均等化、精准化问题上的应用。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17(2).
- [2] 山少男,段霞.复杂性视角下公共危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行为的影响要素与行动路径——基于元分析与模糊集QCA的双重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11(1): 104-119.
- [3] 郑家鲲.“十四五”时期构建更高水平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机遇、挑战、任务与对策[J].体育科学,2021,41(7): 3-12.
- [4] 卢文云,王志华.多重需求叠加下我国全民健身发展战略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46(1): 10-19.
- [5] 史小强,戴健.新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结构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基于“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度量[J].体育科学,2018,38(3): 12-26.
- [6] 刘兵,郑志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转型与发展[J].体育学研究,2023,37(5): 1-10,19.
- [7] 李红,薛海红,王鹏.西安市全民健身路径的组织管理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 321-322.
- [8] 李龙.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的机遇、挑战与路径[J].体育学刊,2017,24(5): 31-35.
- [9] 雷晓康,张田.数字化治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政策路径研究[J].理论学刊,2021(3): 31-39.
- [10] 李乐虎,高奎亭,李可兴.组织社会学视域下我国区域性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公共体育服务的影响要素及路径研究:基于我国3个区域的调查分析[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33(4): 429-437.
- [11] 周学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思考与提升治理能力的路径研究[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5(6): 109-115.
- [12] 郇昌店,张伟.社会体育组织参与体育治理的效应与实现路径[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7,34(1): 9-13,47.
- [13] 高跃,周武.政府主导式角色下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20(11): 38-44.
- [14] 陈丛刊,王思贝.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的根本[J].体育学刊,2022,29(3): 14-18.
- [15] 王恒利,张瑞林.地方政府体育治理:概念内涵、三重逻辑与路径选择[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4): 94-104.
- [16] 雷红.体育公共服务平台协同治理下的体育行政职能转型[J].体育科学,2018,38(9): 47-55.
- [17] 韩晓伟,王凯珍.全民健身研究进展与知识基础透析[J].体育学研究,2019,2(2): 66-72.
- [18] 任波,戴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逻辑、动力与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1,35(2): 39-48.
- [19] 郭修金,陈德旭.治理视域下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身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0(4): 11-16.
- [20] 史小强,戴健.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3): 48-57.
- [21] 章世梁.基于服务质量的宁波市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1,41(2): 32-36.
- [22] 刘红建,高奎亭,徐百超.中国全民健身政策体系演进历程、优势特征及效能转化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2,36(1): 91-102.
- [23] 周生旺,张翠梅,于建成.全民健身政策执行中基层政府角色行为及其评价机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7,32(6): 534-540.
- [24] 卢文云,王志华,陈丛刊,等.以高品质生活引领新时代群众体育高质量发展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3,37(1): 33-46.
- [25] 田彦杰,徐诗枫.全民健身助力全民健康融合发展的路径探讨[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23,18(5): 545-547.
- [26] 王昌友.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与现实路径[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7,34(4): 459-463.
- [27] 戴健,史小强,程华.“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环境变化与战略转型[J].体育学研究,2022,36(5): 1-8.
- [28] 史小强,戴健.“十四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形势要求、现实基础与目标举措[J].体育科学,2021,41(4): 3-13.
- [29] 任海.了不起的人类健身工程——试论我国《全民健身计划》[J].体育与科学,1994(2): 18-20.
- [30] 熊斗寅.从国际大众体育发展趋势展望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发展前景[J].体育科学,1998(2): 3-8.
- [31] 肖林鹏.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概念及其结构[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8(4): 6-11.
- [32] 罗旭.我国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体育科学,2008(8): 81-96.
- [33] 李相如,展更豪,周林清,等.我国城市社区实施全民健身工程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体育科学,2001(2): 28-33.
- [34] 谢林海,彭小澍.我国全民健身活动现状及发展对策[J].体育与科学,2005(6): 36-39.
- [35] 陈颖川,吉建秋,吴明.论大众体育运行的公共治理:内涵、基础及实现途径[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5): 33-36.
- [36] 陆宗芳,罗玲红.公共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模式[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10): 19-21.

- [37] 梁利民,孔祥华.全民健身市场网络的运行机制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3): 5-8.
- [38] 徐嘉若.新时代推进乡村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37(5): 604-607.
- [39] 盖文亮,张振峰.推进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36(6): 694-697.
- [40] 廖钟锋,黄亚玲.共享经济模式下全民健身治理路径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9(6): 30-34.
- [41] 郇昌店,易剑东,童建红.我国全民健身治理历程及转型路径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30(2): 104-108.
- [42] 王昌友.全民健身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向与现实路径[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7,34(4): 459-463.
- [43] 冯振伟,曾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背景下数字赋能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研究[J].体育科学,2023,43(4): 14-23.
- [44] 冯保睿,郑家鲲.数字技术助推社区体育精细化治理: 内涵、机制和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3,37(2): 85-95.
- [45] 高进,武连全,柴王军,等.数字技术赋能体育场馆智慧化转型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J].体育学研究,2022,36(5): 63-73.
- [46] 杨苓,罗亮,孙晋海,等.基于风险视角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研究[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2,38(5): 10-17.
- [47] 李军,董蕾,赵亮,等.数字时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据共享的动态演化博弈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视角[J].体育学研究,2023,37(3): 33-44.
- [48] 王飞,王子玥,王志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数字治理的理论框架、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3,38(3): 309-314.
- [49] 马蕊,贾志强.政府与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联动逻辑及路径创新[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2): 41-46.
- [50] 张文静,沈克印.数字赋能: 体育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实施策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7): 13-21.
- [51] 王志文,沈克印.我国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整体性治理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7,36(4): 19-24.
- [52] 韩宏宇,郑家鲲.公共体育服务精准化供给的内涵、困境及实现策略[J].体育学研究,2021,35(3): 75-82.
- [53] 栾丽霞,张晓洁.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38(9): 25-29.
- [54] 马杰华,舒为平,王佳.西部城市全民健身组织网络与效能提升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J].体育学刊,2021,28(1): 85-90.
- [55] 廖钟锋,黄亚玲.共享经济模式下全民健身治理路径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9(6): 30-34.
- [56] 焦长庚,戴健.网络化治理视域下公共体育服务协同供给: 逻辑、场域、路径[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54(8): 12-19.
- (注: 由于版面限制,参考文献[57-87]略,如需查询,请与作者联系。)

作者贡献声明:

闫静:拟定论文选题,设计论文思路和框架,撰写、修改论文;徐诗视:资料收集,数据分析,撰写论文;温雨竹:资料整理,文献核查,修改论文。

Logic, Elements and Paths for the Governance of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in the New Era

YAN Jing¹, XU Shijian², WEN Yuzhu³

(1.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2.Faculty of Edu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3.Graduate School, Jilin Sport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Accurate and scientific governance of public services for fitness for a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higher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for fitness for all and an important mean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fitness for all and modernize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Clarif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overnance of public services for fitness for all and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actors can enhance the empowerment and capacity of governance of public services for fitness for all. Using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sQCA)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trategy choices of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services for fitness for all in 31 provinces of China. The research first determines the seven antecedents that affect the governance a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of fitness for all, including fitness participation service, fitness facilities service, fitness organization and security service, public budget, production conditions, income conditions, and investment conditions. Then, it forms a diversified configuration by combining various conditional variables. Finally, it determines the core combination pattern and proposes 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of fitness for all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pattern model.

Key words: Healthy China ; national fitness; public service; sports governanc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